

一百五十周年
纪念孙中山诞辰

孙中山与博济医院

文/历史系 朱素颖

在孙逸仙纪念医院(旧称博济医院)内,建有一座纪念碑,碑的正面刻有“孙逸仙博士开始学医及革命运动策源地”17个金字。孙逸仙博士即孙中山先生,此已广为人知,但孙中山先生在博济医院内开始学医及践行革命的经过,一般人恐怕就不大知道了。

故事要从给孙中山施洗的喜嘉理牧师说起。喜嘉理是美国传教会派往中国的牧师,1883年主持建立了香港传教会,他心灵圣洁,志向高尚,很受孙中山敬重。孙中山当时在香港,天天与喜嘉理一起生活,耳提面命之下便于1884年5月4日由喜嘉理施洗入教。

喜嘉理对聪慧的孙中山很赏识,几次三番劝说孙中山成为传教士,担任自己的助手,一同完成“拯救”中国人灵魂的使命。但孙中山心中却另有想法。他对喜嘉理表示,先学医,以后当一位医疗传教士。对此喜嘉理欣然同意,立刻修书给当时博济医院的院长嘉约翰医生,将孙中山大大夸赞了一番,请嘉约翰准其入学并要求减免他的学费。就这样,1886年夏,孙中山提前离开中央书院,来到博济医院,成为了一名医科学生。

但学医其实是孙中山迈向自己宏伟目标的第一步。他后来回忆说,“予自乙酉(即1885年)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由是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借医术为入世之媒,十年如一日。”此时孙中山不过年及弱冠,但他已深刻认识到清廷的腐朽及不可救药,寄望借助行医来接触社会,唤醒国民,实践其革命理想和抱负,充分显示了一代伟人自青年时代起就殊于常人的禀赋卓识。

博济医院首开中国西医教育之河,于1866年在院内设立了中国第一间培养西医人才的教学机构。学制为三年,学生来自中国各地,全部在院内住宿。孙中山住在哥利支堂十号宿舍。由于他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于是兼任院内翻译,以为勤工俭学,基本解决了生活费问题。同届有男生12人,女生4人。

在博济医院,孙中山又显示出了其不同流俗、敢于破旧立新的精神。由于顾虑到中国“男女授受不亲”的陋俗,医院原先不允许男同学到产房进行接生实习。但孙中山13岁便去了檀香山,较少受到封建礼教禁锢,便对嘉约翰大胆建议,大意是“学生毕业后行医救人,遇有产科病症也要诊治,应以病人性命为重,而不应以不合理的礼教为重。”西医本来就没有男生不得学接生的规矩,嘉约翰于是欣然接受。此外,孙中山还成功建议校方撤去了课室中男女生座位之间的帷幔,使得博济医院在吸收西方文明破除封建腐朽习俗方面引领风气之先。

孙中山虽然在檀香山念了高小和初中,后来又到香港接受了英式教育,但他并未放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在博济医院学习课余,孙中山请老师陈仲尧专为他讲授中国经史,并在宿舍里藏有二十四史。同学们常嗤之以鼻,认为他买书只是附庸风雅,装点门面。一天,一个叫何允文的同学随手拿起一本考问,想看他出洋相。没想到孙中山对答如流,分毫不差。何允文惊讶之下,又拿起另外几本一一考问,孙中山都答对了。同学们非常惊讶,从此对孙中山心服口服。

虽然孙中山在博济医院的时间不长,只有不到一年,收获却很大。他认识了一位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的同学兼同志郑士良。他胸怀大志,常指点江山,纵论天下,与同有革命志向的郑士良很谈得来,二人遂结为生死之交。郑士良是广东归善县(今惠州惠阳)人,在广州的德国基督教礼贤会学校毕业。除了基督教徒外,他还有个秘密身份——广东三合会会众,该会以反清为宗旨,后来在辛亥革命中起了很大作用。1895年,孙中山在广州密谋起义,郑不遗余力发动三合会会众参加。起义失败后,与孙中山一道转移至香港和日本,1900年孙中山发动惠州起义,郑士良担任起义军司令。

除了郑士良外,此间孙中山还认识了另一位朋友。一天,孙中山和郑士良等人到十三行去买荔枝,没带够钱,刚好博济医院的毕业生尤裕堂和族人尤列路过,便帮其代付。孙中山与尤列一见如故,成为了好朋友。两人后来又在香港相遇,常与陈少白、杨鹤龄聚首,商议革命,以为乐事,自称“四大寇”,久之,在时人当中颇有盛名。

1887年,孙中山由博济医院转学到了英国医生康德黎创办的香港西医书院,在香港度过了五年的学医生涯。但孙中山和博济医院的缘分并未就此结束。

1895年,孙中山策划乙末广州起义失败,在博济医院友人杨襄甫、尹文楷、区凤墀的帮助下,成功脱难,流亡海外。

1912年4月25日,孙中山在辞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回到久别的广州,当天,博济医院院长谭约瑟和行政主任威尔逊就给孙中山发了亲笔签署信件,邀请其访问母校。他欣然答允,于1912年5月9日回到医院,找到了自己当年的宿舍,并被推选为永久董事,为学校捐献了100元。

1917年,孙中山手令拨西村岗地120亩以扩建医院(后收回),并随后捐献1000元用于扩建博济医院岭南分院。

1925年,孙中山先生去世后被送往协和医院,解剖其遗体的学生里有一位叫秦光煜。1948年,秦光煜来到博济医院担任病理科主任,并于1956年被高教部评为一级教授。

1935年,博济医院百年院庆之时,由孙中山长子孙科主持,“孙逸仙博士开始学医及革命运动策源地”纪念碑揭幕,以志对孙中山及其革命事业的永久纪念。

1938年,宋庆龄到访博济医院瞻视,并在碑下留影(见题图)。

……

“以吾人数十年必死之生命,立国家亿万年不死之根基”。在孙中山先生早期的革命伟业当中,博济医院扮演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并因此光耀千秋,名载史册。今天,我们铭记历史,除了是对先生的深切纪念,亦是为了更好地出发,承继先生“天下为公”的伟大理想,坚定地走向未来。

来之不易的认可

文/附属三院骨外科 董健文

(续354期)

引入中国的治疗组负责制

神经外科在Korle-bu教学医院是仅次于国家心胸中心最重要的外科科室,拥有单独的一层手术室及SICU,其高年资大夫均有欧美学习进修经历,每年对外交流较为频繁,临床业务量大,大多数的脊柱常规手术能在现有的条件下很好地开展,且水平不亚于国内多数三甲医院。遗憾的是,由于体制及与麻醉科间相互配合的问题,每天只能开一间手术室,另一间常常被闲置;有时开台时间晚,接台不及时,手术计划不能按期完成,导致大量病例积压;手术的安排与病人的管理由科室整体处理,不同于国内普遍是由各治疗组负责。

Dakurah主任诚恳地向我咨询,我于是介绍了国内的工作常规,即每周有一次大查房,然后在办公室对所有病例进行讨论,包括术前与术后的,另外每天晨会还会讨论当天手术病例以及次日手术安排,几乎任何一台手术方案都必须经过科室讨论通过,一旦决定,就不能随意更改。

而Korle-bu医院神经外科则仅仅是在周五大查房的过程中、当着患者的面讨论后,即决定并制订下周所有的手术安排表,当然这也是我与加纳同行们进行交流的主要场合之一。通过近两年的努力,令人欣慰的是,基本上涉及到脊柱外科的问题,加纳同事们都会询问我的意见,有时自然也少不了争论甚至是“交锋”。

Dakurah主任听完我的介绍后,连声说好,其实他于年内曾到过三院观摩过我们科室的晨会及手术,他表示他们也要改到办公室进行讨论,包括对术后病例的分析总结。

中国医生好样的,探索特色援非之路

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作为首批援加医疗队队员,我所承担的任务之一就是尽可能多了解当地的医疗现状,了解他们真正需要什么,而我们又能够为他们真正做些什么。

可在加纳同事心中,“援助”无非是设备与金钱,事实上他们大部分设备都是通过这样的途经获得的。时不时也有一些欧美医生来此对他们进行短期技术培训,比如颅脑外科立体定向微创手术,并赠送一些器械设备,这也是最受他们欢迎的援助模式。而我,一名中国大夫,只身来到这里,还存在着不得不承认的语言障碍,谈何“援助”?

试想如果当初我能携带一些脊柱微创设备来Korle-bu医院,必能迅速打开工作局面,毫不夸张地说自己可以在西非甚至整个非洲大陆展开手术方面的众多第一,但这是不可能的,国家不可能在不了解当地实际情况的前提下就投入过多援助。

认可,源于孜孜不懈的努力

记得刚到科室时,当加纳同事们听说我的专长是脊柱微创手术时,他们均夸张地笑着摇头。因为这里根本没有任何脊柱微创设备!尽管他们对此较感兴趣。而我只能向他们强调,微创是今后脊柱外科不可阻挡的趋势,作为在当地最权威的医院工作的大夫,加纳同事们有义务也有责任引进与开展微创技术,从而为患者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

脊柱外科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学科,近20年来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尤其是各种脊柱微创手术技术的不断出现与成熟,但同时也存在很多争议,这也是我与加纳同事们常常产生争论的原因。希望通过一两次讨论就让他们接受自己从未做过的操作与技术是不太可能的,希望他们在现有条件下开展在短期内无法实现的手术也是不可能的,必须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讨论、交流、争论甚至是交锋,才有可能让对方逐步接纳你的观点与方案。

在与加纳同事们进行学术讨论时,我总是本着交流而不是指导的态度,在涉及到任何一个病例的诊疗方案选择时,尽量客观地介绍目前国内与国际上的学术动



董健文医生(中)在加纳做手术

态,尽可能地展示我们的观点,尤其是在可选择多种手术方案包括微创技术时,能分析比较其各自的优缺点,从而找出最适合患者的方案。

由于不可能像国内那样自己独立带一个治疗组进行临床工作,我只能有选择性地开展一些目前加方尚未开展的一些常规手术,尤其是对技术要求较高的脊柱外科手术。希望通过有限的机会向他们展示一个中国大夫的临床操作水平,以此来获得基本的认可,对于外科大夫来说,这仅仅是最基本的认可。

Dong,你来做这一台手术吧,就按照你的方法。

针对加纳医生习惯千篇一律地采用后路手术治疗胸腰椎疾病的不足,近2年来,我通过自己的不断努力,首先在前路手术上取得突破,先后成功地开展了经胸腔前入路、经胸膜后-腹膜后联合入路、腰椎前路手术、经联合切除锁骨内段与部分胸骨柄颈胸段前入路手术,同时将椎弓根钉技术应用于C1-2后路固定于中下颈椎。

这其中不乏对技术要求较高的操作甚至有些是具有挑战性的手术,要知道这里连一台清晰的C臂机都没有,而这些技术的开展,能极大丰富治疗选择,同时也能解决不少临床实际问题,尤其是被应用于一些脊柱肿瘤的切除重建与脊柱失败病例翻修术中。

这些技术对我的加纳同事们来讲并不陌生,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在欧美学习期间均看到过或了解过,只是由于种种现实原因而没有开展。与其说是我开展了这些操作,不如说我是作为一片催化剂促使他们得以尽早开展。现在他们终于愿意说:Dong,你来做这一台手术吧,就按照你的方法。

相信是我的争论引起了他们的共鸣,是我的执着多少改变了他们一成不变的习惯,是我这个来自东方不同的声音激发了他们对不同技术不同观点的探索,我觉得只有让他们改变观念,才能为今后进一步的合作打下必要的基础。

(未完待续)

嗦粉处,即是我家乡

文/历史系 徐坚

虽然尚未达到全国性的声名狼藉,长沙人毫无疑问是排外的。对于那些明显流露出不安和胆怯的外地人,长沙人总是彪悍地甩出一句“乡里鳖”。但是,如何分辨长沙“城里”的和长沙以外的“乡里”的呢?简而言之,问每天早上吃什么?如果回答“嗦粉”,不管你是什么口音,长成什么样子,穿着光鲜还是衣不蔽体,气度雍容还是獐头鼠目,你就是长沙人!看起来,长沙人的标准是文化的,而不是血统的。

每天早上的长沙,满城尽是米粉,四季皆然,风雨无阻。尽管米粉的质量问题是长沙各路媒体最爱炒的冷饭:隔三岔五总能看到米粉为什么那么白,保质期为什么那么长,究竟有多脏多毒的报道,但这丝毫阻挡不了长沙人以从容就义的气概直奔自己最爱的米粉店。

真正令长沙人担心的是现在的米粉味道越来越单调了。即使在最有名或者最小众的米粉店,吃到的米粉也都毫无悬念地是由几家大型食品厂配送的。看起来干净整齐,装在透明塑料袋里,带有各个环节签字盖章的出生证明的米粉,独独缺的是令人熟悉而又渴望的长沙街头巷尾的味道。

据称,最后一批手工制作米粉的小作坊年前已经关张了。传统上,制作米粉是个没有多少技术含量和资金门槛,但市场却出奇地大的手工活,很多刚入长沙的外乡人可能以制作米粉度过移民生活中最艰难局促的日子,而且,只要勤快而诚实,总能为自己的米粉赢得“粉丝”。当然,在城市底层挣扎的人们操持的作坊绝不美观,也绝不可能整饬如实验室,事实上,中国传统食物作坊又有哪家符合现代社会健康的观赏要求呢?我年幼时购买的无论是手工米粉还是机制米粉都是码在竹篾箩里,上面盖着一块湿润的纱布,苍蝇会不时落在纱布上。

那时候没有人喜欢机制米粉,口感太稀,稍微煮煮就溃不成形了。那些早晨六点出摊,随便在墙脚路边的空地支起炉灶,排出几张桌椅,熟客们如同掐着表一样精准赶来的私人粉摊常常用手工米粉,有的甚至是自家制作的。米粉是米浆蒸出来的。制作米粉的米绝不是什么好米,一般采用陈年糙米。磨米浆是个细心活,安心做,不偷懒,不投机就能做好。因此,有的人家做的味道格外醇厚,有质感但又不生硬。

米浆在圆形米桶中蒸成米皮,从纱布上揭下后晾在屋前竹竿上,稍冷后一张圆形的粉皮折叠成大约十多公分宽的一条。有的作坊在卖粉时会在竹篾箕旁放一块砧板,一旦有人买粉,迅速切成一堆扁平粉条。有的粉摊老板可能以刀功见长,于是特地买未切的完整粉皮,自行加工,也会成为自家的一大卖点。我家附近曾经有一家米粉作坊,我每天在晾着米皮的竹竿前穿行而过,有时在家里也能闻到勾人肠胃的米浆清香,这种味道永远不会夹带在机制米粉里。

白白的长沙米粉只是基础,甚至是白纸,而在每个米粉店或者米粉摊,一碗风味独具的米粉端上来才是造化。每个成功的米粉店老板都有他的独门秘笈,而长沙关于米粉店的都市传说层出不穷,而且更新迅速。不过,长沙米粉的操作空间其实不大,无非就是粉汤、盖码和配料。现在几乎每家粉店都宣称“原汤”,即原汁原味的高汤。殊不知对于味蕾早已麻木的川湘人士而言,原汤几近清淡,因此,没有哪家的原汤不是依靠调料提鲜的,之前乞灵于地龙或者蛇肉蛇骨,现在已经转而拜倒在化学制剂下了。而盖码是长沙米粉特别讲究的,任何粉店的码牌都至少列出十多种盖码,既有早已炖好,随时备用的煨码,也有随时待命,落单下锅的炒码。二十多年前的米粉是没有这么复杂的,清汤寡水的“光头粉”和歪歪斜斜躺着几条肉末的“肉丝粉”是最主要的种类。随着各家粉店的盖码越来越雷同,配料也就逐渐成为店家的绝杀技了。

所谓配料,就是些能显著刺激味蕾的轰轰烈烈的食物。长沙以外的湘菜馆给这类食物起了个恰如其分的名字——“外婆菜”,的确是让人怀念外婆的各种咸、辣、腌制、泡制、风干、晒干的素食。起先只是鲜艳的剁辣椒,随后蜂拥而至的是卜豆角、酸豆角、酸菜和排菜。有的精明店家索性以大搪瓷盆装上满满几盆酸菜、豆角之类,放在案上任食客自取。也有憨厚食客端起盆子将半盆豆角拨到自己的碗中,宛如回到童年,在外婆家撒野淘气,只是此时店家的眼神里绝无外婆的慈爱了。

对于米粉店而言,脱颖而出的机会越来越少了,因为米粉都是统一机制和配送的了,高汤都不得不依靠各种浓缩液或者固体味块了,无论是煨码还是炒码,大家都做得越来越雷同了,每家粉店对配料的想像差不多走到尽头了,连清淡的广东粥的配料都被搬上长沙米粉的台面了。但是,令人啧啧称奇的是,长沙从来不缺乏带有传奇色彩的粉店,长沙人也不缺乏一大早穿街走巷追捧心头好的热情。

在呆在长沙的日子里,我总能被人拉着去大隐于市的各个粉店朝圣。坡子街里、天心阁下、湘春门外,都有被各路食客标记出来的必去粉店。北门外的一家粉店里还在推行二十年前的国营粉店作风,先付后食,付款之后得到一堆依稀刷了点颜料的竹筹码,持筹进入厨房,厨师朗声读出筹码内容,分毫不差,海碗码在灶台上,捞粉盖码后自行端走,在一堆煤球或者杂什旁的小桌边坐下,埋头在一堆早到的食客留下的残汤剩水中“嗦”粉,旁边赫然坐着一位睡意朦胧,赤裸上身的老头。店家是如此地傲娇,他总是自信你必然被他的粉、汤、码、料打动!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只有在心满意足地吃完出来,才赫然发现他家外墙上大大的“拆”字,也才回想起刚才在厨房里看到屋顶上露出的大片天空。

“嗦”是个独特的长沙词汇,只有它才能准确地描述长沙米粉的吃法,也只有它才能表达对骄傲的长沙粉店老板们的致敬。长沙米粉必须包裹着“嗦”,必须连汤带水,粉码合一,辣椒豆角酸菜层次分明,必须如同喝日本味噌汤一样发出稀哩呼噜,呼啸而入的声音。一家粉店里,早晨此起彼伏的嗦粉声就是对店家最好的赞扬。“嗦粉”是个新词汇,出现时间可能不足十年,但因为深得米粉精髓而且传神就迅速流行开来。

长沙是个讲腔调的地方。在饭店于市民生活中消失近半个世纪后又重出江湖时,长沙的年轻人迅速地找到还有前朝旧忆的老人,而那些老人们也乐得把他们年轻时吃过、见过或者仅仅听过的东西如数家珍地排出来:粉多叫重挑,粉少叫轻挑,码多叫重码,码少叫轻码,汤多叫宽水,汤少叫窄水,不要葱叫免青,全熟叫溶排,九成熟叫二排,七成熟叫待汛。如此学习之后,我站在灶台边,壮着胆子对厨师说,“轻挑宽水重码双油免椒免青”,厨师默默转身,端出一碗来,“想多什么自己加,想少什么不放就是了”。



春光好(金文) 中文系 陈斯鹏书

新年来了,在满怀对春花春雨的期待中,总有一些别样的深情涌上心头,且借一封素笺,书寄往事,衷心感谢生命中缘来有你……

梁琦老师:

您好!

首先感谢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读这样一封信,我是12级市场营销双学位班生科院的同学。当然,在此我先做声明:此信绝非为着加分等功利事宜,只是从一个学生的角度真诚地抒发对您的敬意和感谢。

昨天《国际结算》结课了,我却真心希望能多听您再上几次课。对于我来说,这门课程教会了我太多。我敢说,在我的学习生涯中,从来没有老师让我如此震撼。您拿起书,各种案例就可信手拈来。奇怪的是,听您的课从来不觉得闷,反而心生乐趣。只需一个图或几句话,您就可以把一个复杂的流程讲得浅显易懂;只需要听一遍,您就可以把同学所列举案例中的错误措辞给找出来;只需要一本书,您就教会了我们国际结算的全部精髓。这让我觉得,学习是一个有趣和不断收获的过程,我甚至能感受到自己对这门课从最初的漠然到喜爱。这一切都要感谢您,我的恩师!

让我崇敬的,不仅是您的学术能力和教学能力,最重要的是您自身的人格魅力。又要论到评教当中去了,有的老师为了评教能拿到高分,常常改变自己的教学目标和追求,来迎合学生的口味。这样的课堂像一杯可乐,渴的时候喝喝也就罢了,但营养有限;不渴的时候是断然想不起的。我觉得这种教学会失去老师的个性,从而变得对学生几乎无所要求(当然其实我能理解老师们也有自己的难处)。而您不一样,您就像是一杯浓郁的茶,有深度有广度,我想我这一生都不再会忘记。第一次见到您的时候,我就认为您是一位优雅又有个性的老师。多年的教书生涯仍然没有磨灭您的个性和对学生的期望,您正是这个浮躁的时代所缺乏那种好老师!从《国际结算》这样的课程里,我觉得自己真正学到了一些日后能指导工作且意义久远的东西。

您平常对我们的教导至今我依然历历在目,并且深以为是。做人的确不能太斤斤计较,要坦荡地和朋友交流自己的看法——多做事是对自己的另一种历练。这也是我一直以来告诫自己的:莫计较、莫功利、多真诚!您的教导让我进一步有此体会。

您美好真挚的性情,您的博学无私,让我从心底敬佩您,希望有缘再见您,再听到您的课!您日理万机,在繁忙工作的同时,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一定要记得吃饭。若是太忙可以安排助教上课,不必太勉强自己太辛苦,我想同学们都会理解的。当然对于您每一次的出现和上课,其实我们心里都是充满感动和惊喜的。

最后,祝您工作顺利,家庭幸福。

您的一个学生敬上

(注:梁琦老师为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系主任)

中山大学校报编辑部:

这封信是我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特意写给贵报的。是这样,2015年我的孩子,十岁的小朋友汶汶不幸得了胸椎动脉瘤,跑了好几家医院,医生看片后都说是恶性的,而且术前必须先做穿刺术。我焦虑万分,最后带孩子去到中山大学附属三院。

三院脊椎外科的戎利民教授、董健文教授认真看片研究后,安慰我们不用太焦虑。凭着多年的丰富经验,他们认为肿瘤是良性的,术前不必做穿刺术,以减少孩子的痛苦。他们还邀请了介入科的李征然医生进行术前血管栓塞术,避免了术中大出血。

经过八小时的奋战,手术非常成功,病理检查果然是良性。正是几位大夫的医者父母心使得我的孩子在术中减少了痛苦并得以彻底医治,家长也免除了不必要的医药负担并极大地减轻了精神压力,这样的医者真是妙手仁心,无以为报呀!感激之余,我们想通过中大校报宣扬这些好人好事,把正能量传递出去。通过这件事,我们深感中大真不愧是一所高水平的、人才荟萃的一流综合性大学。

患儿家长 刘兰芬

2015年12月4日